

道德智慧的培养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教育思想

郑富兴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 当前人们对于何谓“道德低效”的理解持“忠实取向”和“自由取向”, 两者的缺陷在于对知行的分割理解, 而亚里士多德的品格训练的道德教育思想提出了一种认识和评价道德教育效果的“创造取向”, 即通过道德实践培养学生的道德智慧。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 道德教育; 道德智慧

当前学校道德教育低效已是人们普遍认可的现状。对于何谓“道德低效”的理解大都是认为, 在学生的言行中没能体现出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或要求。但是, 应该怎样理解“体现”呢? 这是人们没有深究的问题。从一些文章来看, 谈论者似乎持两种取向: 一是“忠实取向”, 即学生的言行要体现学校道德教育教导的内容才算有效果。但是, 学生不是机器人, 在“主体”一词流行的今日, 这种观点是不道德和不民主的。一是“自由取向”, 即学生是一个道德主体, 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我们只是培养其道德思维能力。但是, “知善”并不能保证“行善”, 通过行为训练培养一定的道德习惯是必须的。因此, 两者的缺陷在于对道德知与行的分割理解。那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德教育效果呢? 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教育思想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答案。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传统道德教育的开创者, 即品格训练的西方道德教育传统。他的道德教育思想是西方传统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他对的伦理美德的理解、对实践智慧的强调、强调行为习惯培养以及城邦之外无道德等观点, 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在美国复兴的道德教育的基本理论元素。因此, 他的道德教育主张也被人称为“品格教育”。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 杰勒特·维贝克 (Gerard Verbake) 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总结了亚氏的道德教育思想: (1) 人在本性上是道德的动物, 因此,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道德教育就是人更完善地成为他的本己; (2) 尽管所有人都具有自然的定势, 但他们都需要接受一种适宜的道德教育; (3) 道德教育意味着不仅是学习, 也是训练, 即包括理智的准备和习惯的获得, 一个人成为道德的人, 就好比一个人成为熟练的工匠一样; (4) 一个具有道德的人被赋予实践智慧, 即使他在最变化多端的生活情境中也能形成正确的伦理判断。^[1]这基本上概括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教育思想, 其中也谈及实践智慧的培养。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教育或道德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本文主要根据《尼各马科伦理学》关于实践智慧培养的思想, 谈及现代道德教育的“创造取向”目标, 即培养学生的道德智慧。

一、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和品格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二卷第六节, 列出了其美德的定义: “美德是一种选择方面的品性(state)——依据相对于我们的中道(mean), 这种中道由理性决定, 像一个

有实践智慧的人会规定的那样”。^[2]（本段译文参照了包利民的翻译（《生命与逻各斯》，第232页）。virtue在伦理学术语译为“德性”，笔者在教育学的语境里译为“美德”，有时也称为“德性”。在古希腊，virtue的原初意义是指事物的优秀（arete），最后涉及事务的功能和目的，在道德上就是优秀德性，故选择了“美德”的译法。）这是一段提纲挈领的定义，包含了“中道”、“实践智慧”、“选择”等亚里士多德道德教育理论的关键词。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理解：

1、美德是一种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由三种东西生成：感受（feeling）、潜能（capacity）和品性（state）。美德不是感受和潜能，因为它不是天生的、不可选择的；美德是品性，既不是出于本性也不是反本性生成的，而是自然接受了他们，通过习惯达到圆满的。^[3]也就是说，美德的获得是在先天潜能的基础上，通过朝好的方向引导、训练和实践而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心态习惯，即第二天性，这就是品格，即符合道德标准的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美德就是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优秀成绩的品性”。^[4]品性是关于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模式，涉及对一定情感和行为的回避。这里的美德主要是指伦理美德。亚里士多德由此认为，美德就是情感和行为上的中道（mean），即在应当的时间、应当的情况、对应当的对象、为应当的目的、按应当的方式去感受这些情感和行为。^[5]

2、重视行为训练和习惯培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美德是灵魂的美德，灵魂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两个部分。相应地，他把美德分为两类：一是理智上的美德（Intellectual virtue），主要由教导而生成、由培养而增长，需要时间和经验；一是伦理上的美德（Moral virtue），伦理美德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因此，伦理美德通过习惯形成的，即像其他技术一样，必须先进行实现活动，才能获得这些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于美德的形成非常强调行为的作用。他提出形成美德的三个步骤：“1）他必须有所知；2）他必须有所选择，并因其自身而选择；3）在行动中，他必须勉励坚持到底。”^[6]也就是说，对于美德，不仅要知，进行理性选择，而且要不断地、反复地行为才能形成美德。“只有像公正和节制的人那样做事，才能成为公正的人和节制的人”。^[7]亚里士多德批评了那种重视思考而没有行为的做法：“有些人什么合乎美德的事情都不去做，躲避到道理言谈中，认为这就是哲学思考，并由此而出人头地。这正像别人，很认真地听医生所说的话，却不作医生所吩咐做的事。正如言谈不能改善就医者的身体状况一样，主要的哲学思考也不能改善灵魂。”^[8]这段论述针对的是柏拉图的思辨性伦理思想。他充分重视理性和习惯的结合，认为柏拉图的把全部美德等同于理性是错误的。显然这对于今日的价值澄清和道德推理的教育方法也不无警示意义。

3、关涉选择和责任。美德并不只是行为和情感的选择，而是包含了理性的因素，这体现于它关于“选择”的论述中。由于美德是依据中道对品性的选择，因此，“选择”就成为了美德的重要因素。作为终极目的的“幸福”是不能选择的，选择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这一点明显区别于无先验目的的现代道德伦理（功利主义除外）和道德教育。麦金太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任何一个选择必须参照一个确定的目的才能进行，这目的是选择的标准，如果对此目的进行考虑，就意味着把它当作手段并以进一步的目的作为选择的标准，这样一直推至终极目的，即不再选择的目的——幸福。^[9]

4、实践智慧。实践智慧（phronesis）^①是关涉选择的，是古希腊四大美德之一。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实践智慧，认为只有合乎实践智慧的品性才是美德，而且，这种品性不仅要合乎正确理性，还要与它永不分离才是美德。人只要具备了实践智慧这一种美德就具有了全部美德。而且实践智慧和伦理美德是相伴随、不可分的，没有美德就不存在实践智慧，没有实践智慧也不存在主要的善；美德提供了目的，实践智慧则提供了达到目的的手段。^[10]实践智慧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不同于其他理性，如技术（art）、科学（knowledge）、智慧（science）、理性直觉（Intuition），虽然他们都以真理为目的，但是实践智慧涉及可改变的对象，所以不是科学；实践智慧以行为自身为目的，在实践之外不制

造什么东西，所以不同于技术，实践智慧就是善于策划对自身有益的善以及有益之事，^[11]是对人的善，是根据理性进行实践的品性。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能够明察什么是对自己和人们是善的，即善于理家庭、治理城邦的人。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实践智慧与思辨理性，认为前者是关于人的行为选择，依据伦理的和实际决定来行为；后者是人类普遍获得的和永恒知识的方法。思辨理性以客观中性事物为对象；实践智慧则以对整个生活的善和有益的事务为对象，而且实践智慧也追求真理（truth），但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和正确理性相一致的真理（即中道）。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是实践的理性，它反对柏拉图的纯粹思辨理性，其目的在于寻求中道原则。^[12]

二、亚里士多德的品格训练思想

亚里士多德正是在其品格和美德的理解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品格教训练的道德教育思想。它的美德理解本身就体现了其品格训练的教育思想，具体表现为强调习惯培养、行为训练和实践智慧的获得。

亚里士多德重视实践的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教育。他认为，对美德事务的道德反思和评价不是年轻人和无经验的人的事，因为年轻人没有各种社会环境中的道德行为经验，没有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经验，而且年轻人受情感的影响大。^[13]因此，亚里士多德反对道德教育中的纯粹思辨，重视道德实践。柏拉图认为美德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表达；美德的生活被理解为符合反映了个人兴趣的一定理性原则的生活，因此他对美德和美德教育（道德教育）的理解是思辨性的。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具有明显的实践性特征，强调道德习惯的培养（即品格训练）。道德教育与西方现代理性道德教育的区别就是二者区别的延续。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事务的目的并不在于思辨知识，而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实践；对美德只知道是不够的，而要力求应用，或者使我们成为善良；美德知识虽然有力量去鼓舞青年们的慷慨，使生性高贵、热爱高尚归于美德，但他们却没有力量去促使大多数人去追求善和美；想用道理来改变长期习惯形成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很困难的。^[14]

因此，亚里士多德主张，我们必须先进行有关美德的现实活动，才能获得美德，即在待人接物中形成美德；没有一种美德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他认为，像艺术一样，美德需要被学习和教导，而不是在问题中学习。这主要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学习而不是学术性或理论性的学习。通过把美德与纯粹的激情或内在的能力相区别，亚氏认为，美德是行为的定势，以固定的品格状态为基础，通过一个主要是实践训练的过程来获得。

因此，在道德教育途径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重视道德习惯的培养。他认为，善和美德的获得有天性、习惯和教育三种途径，但是大多数人必须通过习惯培养学生们的灵魂对高尚的爱好和对丑恶的憎恶。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只有像公正和节制的人那样做事，才能成为公正的人和节制的人。通过同种行为的不断反复、形成习惯来获得美德。“总的来说，品格总是伴随相同的实现活动，我们是否从小养成这样或那样的习惯，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15]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重视经验和实践智慧的指导。美德是中道，而在每件事物中找到中道，就需要技巧与熟练的功夫。如何寻找中道要因人而异，这个过程似乎是一种类似于试错的过程。所以，亚氏说我们很难命中中间，这就需要经验。他认为，年轻人可以通晓几何、算术，在这方面可以称为智慧，却没有人变得具有实践智慧，其原因在于实践智慧针对诸多特殊事物，这需要通过教育才能熟悉，青年人缺少的正是经验，而取得经验需要较长时间。^[16]

三、在道德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道德智慧

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品格-习惯”教育模式与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强调道德理

性的思辨教育模式是西方两大道德教育传统。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复兴的道德教育与60、70年代以来的价值澄清和道德两难推理无疑分别是其现代翻版。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典型的希腊道德教育观：教育是训练品格和好公民的手段。直到20世纪初，它一直是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德教育模式。只是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才逐步衰落。

在现代社会，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教育思想仍具有重要价值。这主要体现为：道德习惯的培养、道德实践和道德智慧的培养在现代道德教育中仍是必要的。

现代道德教育强调道德理性或批判能力的培养，体现了对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尊重，这是我们应该肯定的。但是现代道德教育强调普遍价值的中立性，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青少年道德观的相对主义和情感主义表现，以及知行脱节，却是我们不赞同的。这在美国价值澄清和道德推理等方法的实际效果中可以得到证明。现代道德教育的理性与道德教育中的理性不同，是一种思辨理性，即柯尔伯格道德教育途径的推理思维。现代道德教育强调理性主义道德教育，实际上抽象掉了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是人置身的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和偶然的。英国沃里克（华威）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特利（Michael Luntley）认为，从道德现实主义者（moral realist）的观点看，没有超时空的真理，启蒙运动的超时空真理和普遍理性是站不住脚的，所有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偶然性和多元主义在我们的信仰形成和捍卫的实践中蔓生。他所指的道德现实主义是指这样的信仰：伦理判断能够以对和错来回答，我们的这种推理构成了对事物是怎样的一种回应。因此，他说：“真理也许不是超时空的，但是它能够是适时的，道德教育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对于及时的判断是必要的道德教育。”^[17]

学校（尤其是公共学校）是一个非教派的公共机构，因此，学校道德教育应该是价值中立的。这是与其价值预设相应的，即个人不属于任何社群，自然也不受任何社群价值的约束，现代人崇尚的价值为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开放等，都不隶属于任何群体和阶级。因此，现代道德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中立和虚无主义趋向，教授关于价值或道德规范的推理等认识技巧，却没有真正地教给学生具体的、实质性内容。因此，如果要获得知行的统一，培养一定的道德习惯是必要的。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品格训练途径强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养成道德习惯，对于矫正现代道德教育的形式化、价值中立和虚无的倾向是很必要的。

但是，这种道德习惯并不是如现代道德教育者所批评的那样，是机械地体现或理解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而是一种包含实践智慧的道德习惯。培养道德习惯的道德实践过程包括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推理和决策问题。杨国荣概括了这种实践推论的特征：“实践推论的特点在于，其结论总是与行动或行动的意向相联系。”^[18]例如，从“某人向他人承诺做某事”的事实可以推导出“做出承诺者应该做某事”的结论。通过这种过程反复形成的道德习惯不是盲目的，而是包括理性、情感和行为的习惯。威斯康星大学的丹尼尔·帕特曼（Daniel Putman）博士认为，“以下因素对于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是必要的：控制冲动、抵制诱惑和逐渐意识到他者的需要。……所以这种特殊行为有着一个目的——建立持久的习惯，或者换句话说，发展品格。社会化过程的目标就是品格发展。我们对于哪一个特点的特质应该被强调不能相互赞同，但是社会化目标本身就是深深地建立根深蒂固的习惯，家长或教师认为对儿童和社会的将来和利益是必要的。”^[19]这种实践中形成的智慧也逐步融合在习惯之中，不断成为新情境里道德决策的依据。如前所述，实践智慧关涉到如何确定中道，即在应当的时间、应当的地点，以应当的方式，对应当的人的行为；实践智慧不仅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即在当前情况下盘算、谋划、考虑怎样做才是最好的，而非空泛的好），也是一种主要的美德，没有了实践智慧，人们很难说具有了美德。换句话说，一种理想的道德的确很好，但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做才能体现这种好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品格训练的道德教育思想实际上强调的是道德智慧的培养。这种理解下的道德教育应该是一种培养学生以适当方式运用道德的艺术。儒家的经权统一的关系也说明了这一点。“经”泛指原则的普遍性,“权”则涉及情景的分析,前者体现了道德的规范性和绝对性,后者体现了普遍规范的作用方式受到情境分析的制约,具有变通的意味。^[20]这种对道德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把握,是一种实践道德智慧的体现。因此,在学校道德教育过程中,教师不能以道德理想来要求学生,他应该认识到,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成为道德教育内容的体现者,而是成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以应当的方式对应当的人采取应当的行为的人。这种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学校教育的道德规范,但又在具体的情境中做了灵活的运用。这就是我们提倡的道德教育效果评价的“创造性取向”。

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智慧的途径上,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以看出,道德智慧只有靠时间和经验才能获得的,不是像现代道德教育所强调的是道德的思辨、推理和价值澄清。因此,道德智慧是通过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来获得的,如培养学生在日常特殊情境中做出及时的分析、决策和行动。

其实,即使现代社会里强调对道德问题的批判性反思,这与品格训练和道德反思并不是矛盾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姆·戴蒙(William Damon)认为,关于儿童道德教育中的强调品格特质和习惯培养的途径与强调道德理性途径,这两种途径的对立是一个虚假的区分,因为良好习惯和反思都是道德生活的必要部分,特别是在现代自由社会,两种都需要,而且,实证研究揭示,传统家庭里成长的儿童道德发展较好。^[21]这都说明,即使在现代自由社会,品格训练仍是必要的道德教育途径,人生道德智慧就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步积累获得的。

参考文献

[1] Verbeke, Gerard. *Moral education in Aristotle*.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0.231-233.

[2][3][4][5][6][7][8][9][10][11][12][13][14][15][16]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D. P. Chase trans. London: Dent. 1930. 1094a1. 中译本:《尼各马可伦理学》(修订版),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1106b35-1107a、1103a20-25、1106a20-25、1106b15-30、1105a30-1105b1、1105b5-10、1105b10-15、1110b10-37、1144b20-1145a5、1140a25、1095a3-8、1139a31、1179b1-20、1103b23-25、1109b25-26、1142a11-14.

[17] Michael Luntley, *Postmodernism and the education of character*. In: Power, F. Clark & Lapsley, Daniel K. *The Challenge of pluralism: education, politics, and values*. Notre Dame, Ind.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2, 185.

[18][20] 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7、192页。

[19] Putman, Daniel. *The Primary of virtue in children's mor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1995,24 (2). 175.

[21] James Arthur and Richard Bailey. *Schools and community: the communitarian agenda in education*. London: New York: Falmer Press, 2000. 41, 45.

Educating for Moral Wisdom: On Aristotle's Thought on Moral Education

ZHENG Fu-xing

(Moral Education Institut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At present, people's comprehensions on "low effect of morality" have faithful and free orientations. The defect of these comprehensions lies in separating out knowledge from action. The Aristotle's thought on moral training put forward a creative orientation that is used to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moral education. This kind of orientation require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moral wisdom by moral practice.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Aristotle; Moral Wisdom

收稿日期: 2005-06-10;

作者简介: 郑富兴 (1974-), 男, 四川隆昌人,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讲师, 教育学博士, 研究领域为道德教育、比较教育、教育管理。E-mail: zhfxbj@163.com。

^① 英文译为 "prudence", 或 "practical wisdom", 而中文译为 "明智" (苗力田) 或 "实践理性" (包利民)。本文采用了 "实践智慧" 的译法。